

閱聽人研究實踐轉向理論初探

王宜燕*

投稿日期：101年1月30日；通過日期：101年6月3日。

* 任職於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e-mail: iywang0127@gmail.com。

《摘要》

本文立意為時下閱聽人景觀發生變遷，以致閱聽人理論與經驗現象出現諸多落差而尋找新的閱聽人典範。在檢視過近年來閱聽人研究的新發展後，發現以實踐典範最具重寫閱聽人研究的潛力。本文繼而耙梳與閱聽人相關的實踐理論重要概念，之後建立起以「實踐轉向」研究閱聽人的六項綱要，對閱聽人的研究焦點、閱聽人預設、媒介觀、脈絡觀、閱聽人主體性、以及研究方法均有新的詮釋，本文擬以此六項綱要做為未來進行閱聽人研究實踐轉向經驗研究之理論基礎。

關鍵詞：生活形式、共通實踐、媒介文化、實踐轉向、閱聽人

壹、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

歷來有關閱聽人 (audience) 的名稱有諸多說法如「大眾」、「觀眾」、「使用者」、「目的地」、「接收者」等等，這些名稱的背後暗藏研究對閱聽人本質的預設，如效果研究聚焦於研究「受眾」、接收分析預設閱聽人是會主動詮釋文本的「主動閱聽人」、觀／展典範則視閱聽人為心繫他人目光而進行各種展演的「自戀閱聽人」……，由於傳播科技日新月異、全球化版圖日益擴張，使得閱聽人景觀一再地變遷，光是閱聽人一詞就備受挑戰，誠如汪琪等所說：「……種種發展刻畫出傳播景觀已跟我們熟悉者大不相同，這些發展指出變遷的新方向並曝露出過去使用的分析架構明顯不足」(Wang, Servaes, & Goonasekera, 2000, p. 1)，足見過去的理论與當下的經驗現象出現差距，反映在閱聽人方面，過去的分析架構有哪些不足呢？

首先，攸關閱聽人的定義問題，究竟何謂「閱聽人」？從效果論的大眾媒介下刺激的反應者「受眾」、到接收分析界定在解讀的當下才是「閱聽人」，時至今日進入到後電子社會，究竟網路時代互通 Email、在臉書上按讚、在 Twitter 上推文的人可否稱之為「閱聽人」？如 Bird (2003, p. 2) 所說：「閱聽人是無處不在而且不在任何地方」，使得「閱聽人」一詞頓失依靠，面臨崩解，究竟閱聽人研究要如何重新界定所謂的研究主體「閱聽人」？

其次，閱聽人接收脈絡日新月異，打開電視可看到本土偶像劇、日劇、韓劇、大陸歷史劇、歐美影集等等，加上遨遊網路、使用 App，即使走在路上或捷運站也有大型螢幕強力放送影音，堪稱「媒介無處不在……，人們已是渾然不覺地浸泡 (immersed) 於媒介中」

(Abercrombie & Longhurst, 1998, p. 105) ; Appadurai (1996, p. 4) 也指出，電子媒介加上大眾遷移「使得閱聽人與影像同時流動，製造出特殊的不規則性，致使二者不再能輕易套入地方、國家或地區的空間」，例如，時下台灣的韓劇迷多上中國大陸網站與韓國人同步收看最新的韓劇，不用等幾個月後台灣的有線電視翻譯配音才看得到；但是反觀傳統閱聽人研究往往故步自封一如 Hay (1996, pp. 362-364) 所說：「效果研究一向將閱聽人與日常生活的複雜性括弧起來，……而民族誌雖考慮到閱聽人的日常生活實踐，但卻忽視閱聽人在日常生活的移動性……如電視閱聽人研究多視電視為一個定點，就分析這個定點，……沒有反思到這個定點是位於其他定點與空間指涉的景觀之內」。因此，閱聽人研究是否也應從分析經驗主體在定點取用訊息或文本的取徑破繭而出，重新考慮電子媒介與大眾遷移造成的文化流動，以及由此而來的斷裂與重新接合對閱聽人接收脈絡會造成何等的影響？

第三，閱聽人接收的媒介也不再能定於一尊，傳統閱聽人研究多視媒介為一種「中介」，而閱聽人就是在接觸這些「中介物」後會產生種種接收行為的人，但是時下的閱聽人已是「浸泡」於媒介中，例如「有梗」、「殺很大」等流行語之所以傳散開來，很多人並非從接觸媒介而知曉，而是從聽別人說、甚或逛夜市耳濡目染而來，可見媒介與社會、文化、生活等結構交纏一起，如 Alasuutari (1999, pp. 7-8) 提出的「第三代接收分析」關注的是媒介在當代社會的文化位置，藉以掌握當代的「媒介文化」，因而時下閱聽人不再只是「使用」、「接觸」媒介而已，而是生活、浸泡於整個「媒介文化」，這樣失去「中介」意義、且與各種結構交疊的媒介該如何進行研究？

第四，係閱聽人研究關注的焦點問題，在效果論當道時，千篇一律關注的是傳播對閱聽人有沒有改變其行為或態度的「效果」問題，及至

接收分析興起，轉而關注閱聽人解讀文本的能力，然而時下閱聽人不但有豐富的跨地域視覺經驗，還把來自世界各地的角色、情節與各類文本舉一反三，成為獨具一格的在地文化實踐，例如 NBA 台裔球星林書豪掀起的「林來瘋」（Linsanity）風潮，我們這邊則延伸出「您來瘋」的廣告詞；師大附中的畢業典禮就曾把禮堂布置成《魔戒》的中土世界……（楊正敏，2004 年 6 月 10 日），這些閱聽人接收後而來的創意之舉，既與傳播效果無關，也非關詮釋能力，閱聽人研究要如何重新調整研究焦點才能納入這些久被忽視的閱聽人實踐？

以上這些經驗面向使得閱聽人的定義、接收脈絡、媒介觀、研究焦點等攸關閱聽人的基本預設，都產生動搖，如同 Kuhn（1972／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錢永祥譯，1994，頁 116）指出的出現「典範變遷的契機」：「導致典範變遷的異常現象一定會對現有知識體系的基本預設提出最嚴重的挑戰」。因此，本文研究目的即在值此閱聽人研究各種基本預設皆面臨挑戰、研究典範不得不進行轉向之際，希冀能為閱聽人研究找到新典範，以新的研究取徑來解決時下理論與經驗間的諸多落差。

貳、檢視閱聽人理論發展之新趨勢

從本文的問題意識可見閱聽人研究已瀕臨「典範變遷的契機」，如同陳雪雲所說：「閱聽人研究典範正處於解構和重構的狀態」（陳雪雲，2004，頁 337），究竟閱聽人研究該如何轉向？以下將先審視近年來閱聽人研究提出的新理論，從中耙梳出理論發展的趨勢所在：

一、**第三代接收分析的興起**：Alasuutari（1999, pp. 2-9）將「接收分析」典範歸納為三個世代：第一代接收分析主要立基於 Hall 的「製

碼／解碼」模式；第二代接收分析則是民族誌轉向，研究者遠離媒介轉而聚焦於日常生活中的解釋性社群；第三代接收分析則試圖把媒介帶回研究，且是從論述或建構觀點研究媒介與閱聽人，主要包括三個特點：注重研究者的反思性、從研究閱聽人的心理轉向社會學視野、以及強調整個「媒介文化」。

由此可見第三代接收分析是將媒介與媒介使用置於更廣的架構，閱聽人的接收脈絡已是與社會、生活整個交纏在一起的媒介文化，因而接收分析也應跳脫文本的小框框，以研究整個媒介文化對閱聽人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為新的研究取徑。

二、觀／展典範的出現：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提出的觀／展典範強調閱聽人身處「表演的社會」，因而同時是閱聽人與表演者，他們擷取 Appadurai 的景觀理論，指出閱聽人能從媒介景觀（mediascape）汲取想像力所需的資源，透過自戀與奇觀的循環過程，建構與再建構身分認同（Abercrombie & Longhurst, 1998, pp. 74-76）。

觀／展典範凸顯閱聽人的主體性是一再建構的過程，因而閱聽人的主體性不單是被社會建構，而是也能透過主體的能動性再形構其身分認同；此外，觀／展典範強調閱聽人接收跨地域的媒介景觀，這比定點的文本更能在全球化時代描繪資訊、影像越界的流動以及閱聽人在日常生活浸泡於媒介的意象。

三、想像力已成社會實踐的觀點：Appadurai 不但提出電子社會與大眾遷移造成五種景觀，更進一步指出新的全球文化過程是「想像力已成社會實踐」（the imagination as a social practice; Appadurai, 1996, p. 31），意指想像力已進入日常生活邏輯，一般人開始將想像力運用在每日生活實踐上，而且想像力還是集體的資產，這是由大眾媒介集結而來一起想像的「感受社群」（community of sentiment），如 Anderson 指印

刷資本主義讓彼此不見面的人有一體感，形成「想像的共同體」，而電子資本主義這方面更神通廣大，不只在國家層次作用，這樣的感受社群是跨國的、後國家的，有形成跨地方社會行動輻合的可能性（Appadurai, 1996, p. 8）。

Appadurai 視時下的想像力為行動的發動機，集體的想像力更可成行動的燃料，為閱聽人研究開發跨地域、具創意的新視野。

四、媒介研究的實踐典範：Couldry（2004, p. 117）的媒介實踐典範堪稱媒介研究的去中心化，這是將研究焦點從媒介文本或生產結構，轉而導向研究媒介的各式實踐，以將媒介置於更廣的行動與知識的社會學中。Couldry（2004, p. 121）指出所謂的媒介導向實踐（*media-oriented practice*）是人們從事各種跟媒介有關的行為，因而關注人們做些什麼跟媒介有關的事情（實踐），以及說些什麼與媒介有關的事情（論述）。他初步提出的分析方法是媒介導向的實踐具有固定並組織其他實踐的作用，他稱之為儀式性實踐，重點是先找出儀式性實踐，接著就能發現媒介實踐與其他種類實踐可能的層級關係（Couldry, 2004, p. 127）。

Couldry 提出的媒介實踐典範透由聚焦於媒介實踐上，凸顯出媒介與社會、文化、生活是互相交纏的結構，因而媒介實踐典範比以往視媒介為文本或生產過程，更能兼容並蓄，不落於偏向結構面或閱聽人能動性的片面之見。

五、閱聽人景觀概念：Hay（1996, p. 365）的「景觀」（*landscape*）概念是將閱聽人界定為空間的研究，Hay 指出：「景觀概念不只強調身為閱聽人包括占據一個定點，還暗指一個實踐場域，這個場域涵蓋傳播與閱聽人，而且從中只部分建構他們」。所謂在此實踐領域閱聽人只部分被構成，這是因為「景觀」概念是解構閱聽人研究主流的概念，凸顯

景觀的不穩定性、流動性，是持續的形成、跨越、組構，因而以「景觀」進行閱聽人研究是不可能明確刻畫出閱聽人穩定、真實的全貌。

景觀概念指出閱聽人研究一向忽視空間面向，未嘗考慮日常生活為由空間建構的實踐領域，以往的閱聽人研究只重視閱聽人的意義生產，忽視閱聽人的空間生產面向，即前述閱聽人的實踐場域，因而景觀概念提供閱聽人能動性的另一種視角。

從以上檢視近年來閱聽人研究的發展趨勢，可歸結為以下幾個重點：

(一) 愈發重視閱聽人接收媒介內容後的行動、實踐：以往閱聽人研究多忽視閱聽人接收媒介內容後的林林總總實踐，因而如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的觀展典範即轉而關注閱聽人在吸收跨地域的媒介景觀後會有怎樣的在地展演、Appadurai 強調即使想像力也成了閱聽人的日常實踐、Couldry 的媒介實踐典範直接點出新典範研究的是閱聽人說些什麼及做些什麼等與媒介有關的實踐、Hay 的景觀概念也直指應關注閱聽人由實踐領域而來的空間建構，這些理論凸顯出閱聽人研究長期來未將焦點置於關注閱聽人各式各樣的實踐，而這失落的部分潛藏閱聽人豐沛的行動力、能動性及創造力，是閱聽人研究極需重新聚焦及探究的部分。

(二) 強調媒介文化的重要性：如 Alasuutari 指出「第三代接收分析」不再視媒介為文本，而是關注整個媒介文化對閱聽人接收的影響；Couldry 的媒介實踐典範則點出媒介是如何鑲嵌於社會、文化與生活交纏的結構中，可見時下研究趨勢不再只關注媒介的意義面，而是放眼媒介文化，強調媒介與日常生活、文化無法切割，閱聽人研究對媒介的定位勢必置於更廣的脈絡來看。

(三) 閱聽人的接收脈絡不可同日而語：如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的觀／展典範是置於全球化脈絡、Appadurai 的「感受社群」其集體想像力是跨地域、後國家的、Hay 的景觀則呈現脈絡是交疊的空間，不但有實質的空間還有概念式空間，因而閱聽人的接收脈絡已從定點、文本擴大到整個生活脈絡，且其脈絡觀還是跨域、交疊、不斷成形中。

（四）強調社會學的視野：Alasuutari 指出第三代接收分析從研究閱聽人的心理轉向社會學視野、Couldry 的媒介實踐典範是將媒介置於更廣的行動與知識的社會學中、Appadurai 關注的是跨地域的集體社群實踐，都可見閱聽人研究的焦點不再是閱聽人的心靈黑盒子或其個別的解讀能力，而是轉而關注閱聽人的網絡、社群、互動等社會學意義。

從以上的閱聽人研究新趨勢可見，閱聽人研究應轉而聚焦於閱聽人接收後的各式實踐，而媒介觀應擴大至正視媒介文化的整體性影響，且閱聽人的接收脈絡也應跳脫定點接收視野，並多關注閱聽人的網絡互動，這些對閱聽人預設的調整，都與關注行動者實踐且強調整體觀的「實踐典範」有關，因此本文接下來將嘗試從社會學領域嫁接實踐典範，進行閱聽人研究「實踐轉向」可行性之探究。

參、實踐理論與閱聽人研究相關之重要概念

Stern (2003, p. 186) 在「實踐轉向」一文中指出，實踐理論家對如何理解實踐誠屬見仁見智，不但對什麼是實踐看法南轅北轍，相關術語也五花八門，因而實踐理論家間的歧異性很大。由於實踐理論尚未有系統化的理論共識，而且這些理論也非用於研究閱聽人，因而本文接下來將把與閱聽人研究相關的實踐理論重要概念羅列出來，做為之後歸結出閱聽人研究「實踐轉向」綱要的概念基礎。

一、與閱聽人接收脈絡有關的實踐理論概念

(一) 海德格的「在世界之中存有」(being-in-the-world)

Heidegger (1962/陳嘉映、王慶節譯, 1989, 頁 68-69) 在《存在與時間》中反對柏拉圖、笛卡兒以降的身心二元觀點, 認為一旦區分(主體)察覺某物(客體)的存在時, 即遠離經驗以及不假思索的瞭解, 他指出主客體二者無法分開, 行動者是「在世界之中存有」(being-in-the-world): 「它意指著一個統一的現象, 這一首要的狀況必須作為整體來看, 我們不可把『在世界之中存有』分解成一些可加以拼湊的內容」, 可見行動者與世界是無可分離存在的結構, 人跟世界是一種主客不分的共在關係。

海德格以 *hammerness* (與槌子合一) 來解釋「在世存有」的概念, 例如手拿槌頭槌釘子的人, 是一種 *ready-to-hand* (上手) 的狀態, 亦即當在槌釘子時是渾然未覺手中的槌子, 除非發生中斷的情況 (*breaking down*), 如槌子掉落, 否則是處於 *hammerness* (與槌子合一) 的情境。因而, 身為觀察者的研究者可能討論槌子並歸納其屬性, 但對拋擲於槌東西且未有中斷情形介入的人來說, 槌子及其屬性根本不存在, 是一種主客合一的「上手狀態」。

海德格的「在世存有」概念是將人的存有實質地置於具體的時空脈絡中去理解, 而人作為主體是無法超然獨立於這個世界之外、與這個世界無涉, 日常生活中主體與外界並未分離, 但是傳統知識卻是主、客分離, 這是理論家看世界的方式, 而事實上主體是渾然未覺的在世界之中存有, 並非以主客二元對立的客觀觀點看待外在世界。

影響所及, 實踐理論常強調其是一種提供可逃離主客體二元對立觀

點的理論，因其聚焦於行動主體的實踐上，是從在世存有、主客體合一的觀點出發。

（二）維根斯坦的生活形式（form of life）

維根斯坦提出的「生活形式」概念，成為很多實踐理論家援引做為解釋行動者行動的「脈絡」、「結構」或「背景」，換言之，行動者生活的世界並非一個模糊空泛的空間，或是純粹默然的背景，行動者是置身於世界的某種「生活形式」之中。

維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指出：「我們必須接受，並視之為理所當然的，乃是一——也可以說是一生活形式」（Winch, 1958；轉引自張君玖，1995，頁 72），這裡的「必須接受、視之為理所當然」常被理解為是從遵循規則的角度來看「生活形式」，如陳巨擘就指出：「生活形式包括遵循規則以及受規則約束的行為」（陳巨擘，1995，頁 7），但要遵循規則並非需要鉅細靡遺的規定，如 Winch 強調：「遵循規則是有意義的行為」、是一種「獲得應用判準的能力」、而且需要「反思的能力」（Winch, 1958／張君玖譯，1995，頁 71-93）。

可見當行動者置身於某種「生活形式」之中，他即在潛移默化中習得如何遵循規則，此規則並非有清楚的明文規定，而是行動者置身此「生活形式」之中，從日常生活的實際情境耳濡目染而來，讓行動者能以相同的方式延續遵循規則的行為，因而不是有一套鋪天蓋地的規則網絡亦步亦趨地規範行動者遵循規則，也使得生活形式中的規則不全是制約性，也具有改變的彈性。

因此，維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為實踐理論提供「脈絡」的新詮釋，「生活形式」的脈絡觀不只視脈絡為制約、框限行動者的結構，行動者同時也可能因應變化而調整、改變此結構，因而結構與行動者是

共構且是一體的兩面，對閱聽人研究素來的權力結構 vs. 閱聽人活動、鉅觀 vs. 微觀、全球（生產與傳布）vs. 在地（接收）等研究裂隙提供彌合的理論基礎。

（三）Giddens 的結構

Giddens 在其「結構化理論」中將結構界定為規則和資源，主要強調結構並非體現為人的行動的「外在之物」，事實上結構是銘刻於行動者的記憶刻痕，讓行動者在社會實踐中身體力行，因而結構其實是「內在於」行動者，通常是被召喚出來展演的。但 Giddens 指出結構具有「制約性」（constrain）也就是規則面的同時，也強調結構具有使動性（enabling），因為結構中的資源可以讓行動者以各種方式動員而達成其目的（Giddens, 1984／李康、李猛譯，2002，頁 25）。

Giddens 的結構概念強調結構並非外在之物，而是已內化於主體，結構中的規則會使得行動者的社會實踐有共通性，因而再生產出結構，但行動者也可擷取結構中的資源而使結構發生變遷，因而 Giddens 的結構概念是生生不息的「結構化」，有助化解傳播研究形成的兩極論爭。

二、與媒介有關的實踐理論概念

（一）Swidler 的文化工具箱（cultural tool kit）概念

Swidler 提出文化的實踐觀點：「不同的文化情境會形塑不同的文化工具箱或常規劇目（repertoire），使得在此文化領域中的行動者，得以在一定的自主空間中，選擇性地運用不同的文化元素，建構具有社會意義的行動策略。」（Swidler, 1986, p. 276）。Swidler 的文化工具箱包括生活風格與常規性實踐，如信仰、日常生活實踐、藝術形式、儀式，

以及各式語言實踐如聊天、說故事和日常生活中的例行公式。對 Swidler 而言，這些日常生活風格、常規實踐甚至思考事情的方式是我們日常賴以解決各式問題的依據（Swidler, 1986, p. 277），而且工具箱具有階層性與系統性，如「中產階級生活風格」即包括成套具系統性的行為表現及語言使用的風格。

Swidler 將文化界定為多元並存的成套生活風格與實踐的文化工具箱，此文化工具箱很類似前述的生活形式，提供置身其中的行動者在潛移默化中習得常規性實踐，而媒介也是文化工具箱中的工具之一，因此從文化工具箱的角度切入，有助將廣大無邊、深不可測的「媒介文化」一詞概念化，以進行經驗研究。

（二）Collins 的默會知識

實踐理論常用「默會知識」一詞來表述實踐只能做中學，很難將其中運用的知識、理論清晰地表達出來。Collins 指出，默會知識包括我們知道如何做但不知道如何跟別人解釋的事情，而且我們有可能是不知道如何解釋，或甚至是根本不知道我們知道（Collins, 2001, p. 108）。

Giddens 以「共同知識」（mutual knowledge）來解釋默會知識，所謂共同知識是行動者意識無法直接覺察到的知識，這樣的知識絕大多數是實踐性的，是人們在社會中持續完成各種例行活動所不可或缺的部分（Giddens, 1984／李康、李猛譯，2002，頁 5）。共同知識與舒茲的「知識倉儲」（stocks of knowledge）概念也很類似，凸顯人們是生活於具備特殊知識體系的常識世界之中，人們援引「知識倉儲」即知道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也因而知道如何應對進退。尤其，知識倉儲提供人們「類型格局」（typificatory scheme），包括人、事件與經驗的各種類型，讓人們有「公式」可循，從而能以例行方式因應社會生活的具體情

境 (Berger & Luckmann, 1967 / 鄒理民譯, 1991, 頁 55-57)。

從默會知識、共同知識、知識倉儲等概念來看，與 Swidler 的「文化工具箱」有異曲同工之妙，都是行動者置身於生活形式中，從中耳濡目染「默會」而來的成套知識或文化工具／公式，而所謂的媒介文化也可視為其中的一環，使得閱聽人研究的媒介觀不至於囿於狹隘的、有形的「中介物」，也是閱聽人置身其中可以援引、應用的「文化工具箱」或「共同知識」，甚至是在不知不覺中「默會」而來的成套知識。

三、與閱聽人實踐有關的實踐理論概念

由於這部分的實踐理論繁瑣眾多，因而將依實踐的特性區分為：實踐係不假思索的行動、實踐具有類同性或共通性、實踐具有因應性、實踐的結構化面向分述如下：

(一) 實踐係不假思索的行動

Stern 指出：「實踐是人們在例行基礎上所做的事，也就是實踐並非涉及推論能力，而是我們置身於某個生活形式中，是我們天天遵循的規則，我們不是從心理層面（如社會認知）來解釋實踐，而是後面有很多實踐在支持我們的實踐，這些背後的實踐往往是我們渾然不覺、反射的行為，這就是我們置身的生活形式使然」（Stern, 2003, p. 186）；Swidler 也指出，實踐是無意識、自動且不假思索的特質，並非有意識選擇的行動（Swidler, 2001, p. 74）；這樣的實踐觀點具現實踐乃是一種在世存有，主體在日常生活世界中是處於渾然未覺、自然反應狀態。

（二）實踐具有類同性或共通性

Stern 指出生活形式即包括很多的共通實踐（shared practices），所謂共通實踐即活動的型態，這些型態包括行動、配備、活動的地點等，而且由於係共通實踐，我們可從一個人與他人一樣用同樣的方式不假思索行動來理解（Stern, 2003, p. 195）。

Barnes 更進一步指出共通實踐雖係不假思索的共同行動，但並非僵固不變，雖然共通實踐可說是集眾人的習慣而來，但僅僅只是遵從習慣，幾乎不可能導致常規的表現，他以騎軍騎成整齊劃一的隊形此共通實踐為例，這需要隨時由騎兵視地形、當下狀況伺機調整，其中必然包括個體的算計或發揮創意的想像力，才能排列出完美的隊形。由此，Barnes 解釋所謂遵從規則，是不可能以詳盡的釋例來解釋規則，群體之所以表現遵從規則的一致性，並不是靠「規則本身」，而是靠遵守規則的成員，因而實踐是表現在互相依賴、以敏感度互動的社會行動者身上（Barnes, 2001, pp. 23-25）。

由共通實踐可看出，行動者置身於某一生活形式中，於潛移默化習得一套遵循規則的能力，而出現某些共通實踐，但這樣的共通實踐並非鐵律，其中仍會由互相關聯的行動者不斷的修正與調整，這樣的共通實踐觀點可做為理解閱聽人社群互動的參考。

（三）實踐具有因應性

1. Bourdieu 的謀略

Bourdieu 強調實踐有謀略的一面，他舉阿爾及利亞土著送禮的例子，認為送禮的精神真正表現在掌握回禮的時間，但這套送禮系統的微妙之處在於行動者不能不知道禮物交換的真相，但又必須拒絕知道這個

真相，這意指行動者對送禮只知道部分的真相，有部分也不盡知，這即回禮的「謀略」（Bourdieu, 1972/1977, p. 6）。

Bourdieu 藉此強調我們是在生活中潛移默化學到很多行爲，他所謂的熟手（virtuoso）就是深諳生活的藝術（art of living），由於生活情境充滿了不確定性，但熟手就是能運用生活的藝術優游其中，而生活藝術包括在時間流變中的轉折調度、應對進退，這些都不是規則，而是處世的藝術，亦即他所謂的實踐謀略。如 Bourdieu 指出：「實踐型知識像是一套自動調節的裝置」（Bourdieu, 1972/1977, p. 11），行動者與環境是合而爲一的，實踐的背後都牽涉到很多小小的實踐、生活藝術、即興創作，因而是以謀略隨時應變。

2. de Certeau 的戰略（strategy）vs. 戰術（tactics）

de Certeau（1984, pp. xiv-xv）引用傅柯的「權力的微物理學」（microphysics of power）指出，如果規訓已無處不在、日益明顯，那得加緊腳步發現整個社會如何抵抗這股勢力，尤其可從消費者這邊了解可以用什麼樣的「操弄方式」形成反制。這些「操弄方式」即無數的實踐，讓使用者可挪用社會文化生產技術形成的空間，換言之，身陷規訓網中的團體或個人，可使用日常生活中的「戰術」（tactics）或「權宜之計」（making do）形成反規訓網絡。

de Certeau 指戰略意指當有權有勢的主體（所有人、企業、城市、科學機構）可以從某個「環境」孤立出來，讓力量一關係的算計變得可能即稱之爲「戰略」。戰略意指占據某個可被標示爲「正統」（proper）的位置，可做爲與外來者（競爭者、對手、顧客、目標或研究對象）產生關係的基礎。政治、經濟與科學理性都是從這套戰略模型建構而來。

所謂戰術其算計無法靠「正統位置」，因而沒有與異己有明顯的區隔邊界，亦無具體可見的整體性。戰術的位置屬於他者，沒有基地。「正統位置」是經過一段時間在空間上的勝利，與此相反的是，由於戰術不具位置，靠的是時間，因而總是在等待機會，但打贏了後，並未保留戰果，它必須不斷地操弄事件，以把事件轉換成「機會」（de Certeau, 1984, pp. 35-39）。

de Certeau 指出很多日常實踐（說話、閱讀、移動、購物、煮飯等）都具有戰術特性，很多「操弄方式」也是戰術的：如以小搏大、取巧把戲、脫身之道、演習等都是。因此，de Certeau 從使用者的日常生活實踐找到行動者的能動性所在，彰顯出行動者如何跳脫結構揮灑自如，有助提供閱聽人能動性更富創意、彈性的解釋。

（四）實踐的結構化面向

1. Giddens 的「結構化理論」

Giddens 指出社會科學研究不應聚焦於個別行動者的經驗，或是社會總體的存在，而是應將重點置於各種社會實踐，因而 Giddens 認為應該把結構的二元論（dualism），重新建構為二重性（duality; Giddens, 1984／李康、李猛譯，2002，頁 xxxii）。

Giddens 的結構二重性理論主要繫於社會實踐上，社會實踐讓人成為行動主體並且在實踐中具現社會結構。社會實踐最重要的概念是植基於 Giddens 提出的實踐意識，實踐意識源於社會上的共同知識，是行動者無需言明就知道如何「進行」的意識，日常生活慣例即體現於實踐意識層面，此處也是結構銘刻記憶刻痕的所在，使得眾人的社會實踐具有連續性、類同性，而且實踐意識具有的反思性監控，讓行動者在日常生

活中監控著自己的行為並期望他人也監控自己的行為不致逾矩，由此演出社會結構具有的結構性特徵，從而再生產出社會結構；但是實踐意識還具有能力與認識力，同時反思性監控也會監控到非意圖後果，意識到行動未被認識到的條件，從而發揮能動作用，改變既定事態或事件的進程，而有轉換結構的可能性。也因此，Giddens 的結構化理論彰顯在結構不但具有約制性，也具有使動性，行動主體由社會實踐再生產出結構，但此社會實踐也具有轉換結構的可能性（Giddens, 1984／李康、李猛譯，2002，頁 24-27）。

在結構化分析上，Giddens 是先將結構性特徵擱置一旁，然後進行行動者的策略行為分析，尤其關注行動者話語意識與實踐意識，並且著重分析行動者在明確的情境邊界內採取的各種控制策略（Giddens, 1984／李康、李猛譯，2002，頁 302-303）；如 Giddens 分析工人階級的小孩習於以搞笑標誌「我群」，其實由此可看出他們是掌握許多技能與知識的行動者，透過搞笑他們顛覆教室中的規訓權力機制，確立自己的行動自主性，但此非意圖的後果令他們往往半途輟學，因而造成制度形式的再生產，使得他們難以跳脫工人階級，由此也可看出結構以何種方式在行動者的行動中得以維繫，並且由行動再生產出來的二重性。

2. Bourdieu 的習性 (habitus)

Bourdieu 的實踐理論奠基於「習性」概念：「由一套套可以持久運作、可以轉換的稟性組成，是一套套結構化的結構 (structured structure)，其功能即在構造結構，也就是充當實踐和再現據以產生、構造的原則」（Bourdieu, 1977／宋偉航譯，2004，頁 151），Bourdieu 在此強調習性是一種「結構化的結構」，顯示其具有結構的恆常性，而且行動主體有相當程度受到社會的影響，但同時行動主體也具有轉換結構的可能性，因 Bourdieu 強調習性具有創造性：「習性深刻存在於性

情傾向裡，做爲一種技藝存在的生成能力，這是完全基於對實際作爲的掌握，可看成某種創造性技藝」（Bourdieu & Wacquant, 1998, p. 165）。

Bourdieu 所謂的「習性」是一種性情傾向、結構化的結構、而且是持久的但也可轉換，亦即習性並非決定性的結構，而是一種中介，構成個人到社會生活過渡的中間環節，習性將個人「置於鑄模之中」，讓個人得以在無意識中進行各種社會活動，而行動者的日常實踐主要出自習性，習性中固然有客觀社會結構的面向，但如前述 Bourdieu 也強調出自習性的實踐有隨機應變謀略的一面。

四、小結

從以上的實踐理論可見，實踐如 Stern 與 Swidler 指出是人們不假思索的例行行動，而且如 Stern 與 Barnes 所說的共通實踐具有類同性與共通性，這些實踐理論都指出實踐與其脈絡是共構的，行動者置身於某生活形式脈絡下，就會在其潛移默化下出現不假思索且具有類同性的共通實踐，這也是實踐深受結構影響之處，但是也正因爲實踐與脈絡相依共構，脈絡並非一成不變，爲因應脈絡層出不窮的變化，實踐也有其隨機應變的因應性，從而有了更新翻轉結構的可能性。

因此，閱聽人研究若改聚焦於閱聽人接收後的實踐上，實有助於解決「主動的閱聽人」研究傳統忽視接收脈絡背後的結構性因素之弊病，也不會落入忽視閱聽人能動性的文化帝國主義視角，以實踐理論的結構化特性可兼容並蓄此傳播研究裂隙。此外，實踐理論的主客體合一整體觀如「在世存有」、「生活形式」、「文化工具箱」、「默會知識」等也有助修補目前閱聽人研究對閱聽人的脈絡、媒介使用等理論與實際的

差距。

由於實踐理論係出自社會學領域，其研究主體為社會體系中的行動者，少用於研究接觸媒介或置身媒介文化下的閱聽人，因而在援引實踐理論研究閱聽人前，實有必要先建立以實踐理論研究閱聽人的基本研究綱要，以做為提出閱聽人研究「實踐轉向」新取徑的基礎。以下將從研究焦點、閱聽人預設、媒介觀、脈絡觀、閱聽人主體性及研究方法等閱聽人相關面向逐一闡釋，其目的並非主張從概念上來理解實踐，而是做為在進行實踐轉向經驗性研究前，釐清與以往閱聽人研究典範相異之處，作為進入實作場域後觀察的重點所在，因而猶待實作後進行補充、修正。

肆、閱聽人研究實踐轉向綱要

一、從「語言學轉向」到「實踐轉向」——研究焦點從文本轉向社會實踐

閱聽人研究典範歷經從「行為典範」到「批判典範」的轉變，如 Hall 指出這樣的轉變是從行為觀點轉換到意識形態觀點，是意識形態的再發現，也是被壓抑者的重返（Hall, 1995, p. 356），由於意識形態是攸關「表意政治」，伴隨批判典範而來的是研究趨勢興起「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使得原來視語言為透明的「再現觀點」為之不變。

傳統的再現觀是將語言隱喻為一面明鏡，認為語言可以如鏡像般透過描述反映世界。而所謂的「語言學轉向」最基本、也最重要的結果就是明鏡變成凹凸鏡，人們不再信任語言可以如實地映照外在的世界，取

而代之的是建構的再現觀，認為人們是透過語言建構出世界，這種建構的再現觀反對區分語言世界與真實世界，也不接受真實世界先於、獨立於語言而存在，而是認為真實世界本身就是語言建構的產物（Barker, 2000／羅世宏等譯，2004，頁 113-117）。

「語言學轉向」使得閱聽人研究一頭鑽入研究閱聽人的「意義世界」，聚焦於研究閱聽人如何解讀文本、賦予意義，只關注閱聽人解讀時所置身的上下文脈絡（context），忽視解讀是鑲嵌於真實社會結構之中的角度，如 Giddens 指出：「我也承認『語言學轉向』—尤其是那些由解釋現象學和日常語言哲學所帶動的—具有重大意義，但同時認為這一術語具有一定的誤導性。對於社會理論而言，最重要的進展莫過於將言說過程（saying）或表意過程（signifying）與行為聯繫起來，而不是轉向語言自身，從而使我們從概念上重新理解實踐」（Giddens, 1984／李康、李猛譯，2002，頁 xxxiii）。因此，Giddens 提出結構化理論，將研究聚焦於行動者的社會實踐上，視社會實踐為同時建構行動主體與社會客體的根基，行動者和結構是一體的兩面，相互建構。

閱聽人研究的「實踐轉向」是從閱聽人研究「語言學轉向」興起的「主動的閱聽人研究」傳統的再次轉向，如 Couldry 主張的媒介實踐典範不在研究文本（微觀）或生產結構（鉅觀），而是聚焦於閱聽人在接收媒介後會「做些什麼」或「說些什麼」的媒介實踐上，由此實踐典範的整體觀跳脫微觀 vs. 鉅觀的研究裂隙。因此，研究視野不再關乎批判典範強調閱聽人能否以解讀文本而來的「語意民主」翻轉結構或為結構收編，實踐典範下的研究焦點轉而關注閱聽人如何以因時因地制宜的即興創意或處世藝術，靈巧出入結構且悠游於結構。

二、閱聽人的脈絡新詮釋—閱聽人是置身於交錯的生活形式之中

閱聽人研究在「行為典範」效果研究時期，著眼於媒介刺激會引發閱聽人產生什麼短期的、具體的、可測量的態度或行為改變的效果，也因此未關注在此過程中社會體系與傳播之間的互動會造成什麼影響，如 Hay 所說「效果研究一向將閱聽人與日常生活的複雜性括弧起來」（Hay, 1996, p. 362），是典型去脈絡化的研究；及至「批判典範」興起帶來閱聽人研究的「語言學轉向」，研究者開始關注閱聽人如何解讀文本，這樣的研究常將閱聽人的接收脈絡限於定點（如客廳），只注意閱聽人如何在客廳裡埋首文本、抵抗「外侮」，如 Hay 指出：「視閱聽人為論述或文本主體，意味脈絡也是由論述所產製與組織……是視脈絡為根植於文本與詮釋的歷史唯物論中，而非植基於近用、移動、網絡的空間唯物論」（Hay, 1996, p. 369），這樣的脈絡觀是侷限於文脈之中。

到了 Alasuutari (1999, pp. 4-5) 所說的「第二代接收分析—閱聽人的民族誌研究」興起，研究者開始將閱聽人從文本之中解放出來，從而注意到閱聽人置身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將閱聽人的接收脈絡從文本擴大到日常生活，這時關切的焦點在於閱聽人如何在家庭脈絡中使用科技、家庭裡的性別關係如何影響接收等問題上。此時期所謂的閱聽人「日常生活」研究，多半選擇家庭作為電視閱聽人研究的分析單位。然而，日常生活就意指家庭生活？

如 Felski 指出：「日常生活研究的困難之一，在於『日常生活』是一個模糊的概念。雖然『日常生活』表達出一種重複與循環的時間感，但它並未包含特定的空間界線，事實上，日常生活往往被認為缺乏明確範圍，也不具有清楚的空間分化，它可能指涉各種空間（例如家庭、工

作場所、商店…等），以及在空間內的各種移動形式及過程」（Felski, 2002, p. 48）；盧嵐蘭也指出「閱聽人研究的日常脈絡似乎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與變動性，所以在研究操作上便經常切割成若干領域以觀察個別細節，它們或者針對特定媒介種類的使用，或是鎖定特定情境中的媒介使用，另一種常見的處理日常生活的方式之一，便是聚焦於住家或家庭生活之內……家庭被過度放大或是予以理想化」（盧嵐蘭，2007，頁 43）；將日常生活集中於家庭還帶來研究侷限於定點的問題，為此 Hay 提出閱聽人的「景觀研究」，希望閱聽人的日常生活研究更名符其實，能將閱聽人的接收脈絡延伸至更廣的生活脈絡（living context）。

「實踐轉向」的閱聽人研究則視閱聽人置身於交錯的「生活形式」（forms of life）之中，這樣的生活形式脈絡是一種「在世存有」的狀態，亦即閱聽人是渾然不覺地置身於此生活形式之中，但這樣的生活形式並非只是日復一日重複的時空背景而已，而是如 Kishik 指出的「生活」是一種「形式」（formal）的概念：「生活是構連而來的，有其形式，生活無法與其形式分割開來」（Kishik, 2008, p. 12），Kishik 將棋子走步的規則比喻為棋子的「邏輯空間」，這亦即棋子的「形式」，而邏輯空間「多少將片斷的事實結合一起，形成一個世界」（Kishik, 2008, p. 13）。這樣的邏輯空間是有其規則可循，也與行動者在潛移默化中養成遵循規則的行為有關。

因此，實踐研究常聚焦於研究常規、慣例（routines），視常規為日常生活的具體呈現，由於行動者置身於特定的「生活形式」之中，從中耳濡目染生活形式中的常規，因而能與同時置身於此「生活形式」之中的他人一樣，用同樣的方式不假思索行動，因而生活形式即包括很多的共通實踐。

簡言之，實踐轉向將閱聽人身處的脈絡從「日常生活」轉移到「生

活形式」，而生活形式主要體現在行動者遵循常規的社會實踐上，因而對日常生活的界定不在於其延伸的範圍有多大、移動的空間有沒有彈性等問題上，而是關注行動者置身於怎樣的生活形式之中，並從中習得怎樣的常規實踐。

例如以韓劇迷來說，由於大量浸泡於韓劇中，無異置身於韓劇迷的生活形式中，即使從未讀過「韓劇迷 A to Z」或是「韓劇迷 SOP」都能在潛移默化中出現韓劇迷諸多的共通實踐，從這些共通實踐可見其背後受到同一生活形式的影響，這樣的脈絡觀是觸及閱聽人的整體生活脈絡，與行為典範的去脈絡化或批判典範的文脈或日常生活脈絡觀迥異。

三、實踐轉向對閱聽人的預設—閱聽人社群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視「觀／展典範」為重新定義閱聽人是什麼以及閱聽人做什麼而新興的研究，並將歷來閱聽人區分為三種型態：直接閱聽人、大眾閱聽人以及擴散的閱聽人（diffused audience）。其中，他們指出時下的閱聽人乃擴散的閱聽人，意指現代社會人們無時不刻不是閱聽人，由於人們生活於媒介浸泡的社會，媒介與日常生活已密不可分，再加上我們的社會乃「表演的社會」，人們往往同時是閱聽人與表演者，閱聽人就在自戀與奇觀式展演的交互作用下，呈原子化（Abercrombie & Longhurst, 1998, pp. 68-76）。由於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著重個別閱聽人的媒介浸泡、自戀與展演，雖也指出擴散的閱聽人在日常生活中會與他人討論等互動，但其觀／展理論仍是忽視閱聽人彼此互動形成社群面向的意涵，事實上，時下閱聽人的本質與擴散的閱聽人預設很不同，在全球化與新科技輩出下，閱聽人形成各式各樣的網絡，其型態反而不是擴散開來呈原子化：

（一）科技帶來的「再部落化」（retribalization）

如麥克魯漢指出新科技會帶來「再部落化」，亦即深層的、參與的、統合的「感官平衡」將使每個人都介入別人的事務，因而形成親密互動的地球村（McLuhan, 1964, p. 35）。時下隨著電腦中介傳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應運而生的「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y）已普及開來，如 Lindlof 與 Schatzer 定義虛擬社群為「由一群具有共同興趣的人自主性地組成，通常是環繞著特定的文本或是由非電腦中介傳播領域引進的事項（例如肥皂劇或劇中角色）而形成」（Lindlof & Schatzer, 1998），這樣的「虛擬社群」往往保有真實社群的特徵，包括互動、共同的興趣、認同感以及各種成文、不成文的規範等，有其慣例、儀式以及表達的形式。如同 Neuman 指出的「隱藏於一連串新科技背後的邏輯」就是社會「相互關聯性」（interconnectedness）的增加（Neuman, 1991, p. 12）。

反映在閱聽人研究上，時下興起各式各樣閱聽人「網路社群」的研究，如探究討論區、聊天室、新聞群組等，這些研究都無可避免要碰觸「社群」的議題，因而並非研究毫無瓜葛的眾多、個別的閱聽人，反而聚焦於虛擬社群的互動上，足見閱聽人研究趨勢是越發關注閱聽人的連結、互動，而非呈原子化的個別閱聽人。

尤其，在網路上集結而成的各式各樣迷社群，更是閱聽人網路社群中的一大重點，但批判典範與實踐典範對研究迷社群的取徑很不同，也是一種由「語言轉向」轉換到「實踐轉向」，批判典範關注的是迷社群所形成的「詮釋社群」，強調其形成挑戰霸權的次文化意涵，但實踐典範著眼的是迷社群形成的「實踐社群」，不再關注其詮釋能力、或次文化風格的反叛面向，而是聚焦於其以哪些與情境合一、因時因地制宜的實踐來建構與維繫社群。

（二）全球化帶來的「想像社群」

新科技日新月異帶來的另一項變化是消弭時間與空間距離，形成「去疆域化」，造成所謂的「全球化」現象。去疆域化的一個結果是世界各地的閱聽人由接收媒介景觀產生各種的跨境想像。Appadurai（1996, p. 5）特別強調全球化現象中想像力的作用（the work of the imagination），而且指出集體的想像力已成行動的燃料，而大眾媒介更使得集體閱讀、批判與愉悅變得可能，形成所謂的「感受社群」，這樣的感受社群是跨國家、甚至是後國家的，而且會從想像力的分享進而化為集體行動。

證諸閱聽人研究，在全球化脈絡下，研究跨地域流動的影像為閱聽人帶來什麼樣的跨境想像已蔚為趨勢，如我們掀起的看韓劇、日劇風潮，讓閱聽人即使未親自到韓國、日本旅遊，也已經在文化想像中神遊韓、日，這即是從媒介景觀而來的跨境想像，而且這樣的跨境想像是超越國家界線，如在亞洲掀起的「大長今熱」，就讓韓國、兩岸三地、甚至遠在洛杉磯的華僑、韓僑形成後國家的「感受社群」。

此外，Appadurai（1996, p. 4）指出電子媒介加上大眾遷移在世界各地製造出很多的離散公領域，例如美國韓裔社區的雜貨店兼營出租韓劇錄影帶服務，讓移居異國的思鄉遊子或不識愁滋味的二代移民能重新連結對祖國的想像，製造出跨地方認同，並形成獨具一格的離散文化。在族裔景觀與媒介景觀互動下創造出來的跨地方社群，並非由空間鄰近性連結，而是由共享的集體想像力所連接。

由此可見，全球化不但讓閱聽人有豐富的跨地域視覺經驗，還讓閱聽人能突破地域限制，形成跨地域的「想像社群」，成為另一種特殊的閱聽人相互連結形式。

時下閱聽人拜新科技與全球化之賜，有形成各式各樣的閱聽人網絡

之勢，閱聽人研究不能再侷限於研究孤立的大眾閱聽人或個別的擴散閱聽人，還要著墨於閱聽人形成的連結、互動上。如觀／展典範只關注個別的迷出於自戀的身分認同展演，卻忽視整個迷社群的展演，如討論區如何形成「有問必答、有求必應」的「活知識庫」，而且由於網路上有眾多的「潛伏者」（lurkers），使得網路上的迷社群無異形成 Goffman 所說的「劇班」（team; Goffman, 1969），而且他們以各式社群互動來凝聚且維繫劇班，這是擴散的閱聽人未顧及閱聽人社群的面向，因而實踐典範著重研究時下形成的各式閱聽人社群，由此也開展出閱聽人不同的圖像。

四、實踐轉向的媒介觀—媒介文化

行為典範視媒介為中性的刺激或不重意義內涵的訊息；批判典範的媒介則由文本專擅，視文本自有乾坤，是表意政治的場域；觀／展典範則視媒介為媒介景觀，媒介景觀是因應全球化造成的文化流動現象，認為電子媒介加上大眾遷移帶來的斷裂與重新接合，使得媒介「提供大量且複雜的影像、敘事與族裔景觀內容給世界各地的觀者……，這代表世界各地很多的閱聽人經驗到媒介本身是由印刷品、影片、電子螢幕與看板複雜且相互結合的整套內容」（Appadurai, 1996, p. 35），因而媒介景觀一詞很能傳達出人們渾然未覺浸泡於媒介中，並提供給閱聽人跨境的想像力資源。

雖然「媒介景觀」已是成套錯綜複雜的媒介內容，但仍是環繞著以媒介為中心，然而媒介為社會文化的一環，Alasuutari 在分析第三代接收分析時，就指出新的接收分析更強調媒介文化，並提醒研究者「由於當代『媒介文化』相對的日新月異而且傳播科技快速發展，世界文化必

須持續更新框架中如何構想新的『媒介景觀』與媒介景觀中人們的日常生活」(Alasuutari, 1999, p. 17)，在這裡 Alasuutari 指出媒介文化涵蓋媒介景觀，因而將媒介研究置於更廣的視野。

而何謂媒介文化？在此，要將媒介視為媒介文化實有必要與傳統的媒介觀分道揚鑣：

(一) 媒介文化是與社會、生活形式等相互交纏的結構

以時下流行語「殺很大」為例，此流行語之所以流行開來，是因電視新聞、報紙、路上看板、公車廣告、甚至網路拍賣都在用「殺很大」一詞，而其變體「省很大」、「虧很大」、「嚇很大」也迅速普及，因而讓置身於此社會文化的閱聽人耳濡目染而來，無需刻意學習，因為這是閱聽人置身於此生活形式中學到的「共通實踐」，同樣也可說是閱聽人置身於這樣的媒介文化，從各種媒介領會而來的流行文化，由此可見媒介是與社會、文化、生活等結構交纏一起，而所謂媒介文化就是用這樣交纏的結構去重新看待媒介，因而生活形式中自有媒介文化，媒介文化中也有生活形式力量在運作，要去做區分，是傳統媒介觀視媒介是可獨立出來、沒有其他作用在其中的「斷」見。

(二) 媒介文化是種默會知識

由以上的例子可見媒介文化是閱聽人置身其中，自會在潛移默化中耳濡目染而來的「默會知識」，因而媒介文化如舒茲所說的「知識倉儲」或 Giddens 所說的「共同知識」，是置身「其中」默會而來，這其中就包含了社會、文化、生活、媒介交纏一起的結構性力量，也正因為媒介文化是種默會知識，因而行動者置身其中是無法直接察覺到，是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閱聽人。

（三）媒介文化打破媒介是一種「中介」的觀念

不管視媒介為刺激、文本或是媒介景觀，都是視媒介為一種「中介」，遑論傳統媒介研究依閱聽人主要使用何種媒介來區分，就暫且擱置所謂的「電視閱聽人」也上網、聽廣播或使用 DVD 等的「越介」問題。很明顯的，不論是電視、報紙、廣播乃至新媒介都是一種「中介物」，而所謂的閱聽人就是在接觸這些「中介物」後會產生種種接收行為的人。然而一旦視媒介為媒介文化，媒介與上述的結構交纏一起，失去「中介」的實質，又媒介文化是「默會」而來，也無「中介」之實，可見實踐轉向後的媒介觀打破媒介是一種「中介物」的觀念，亦即閱聽人不是使用、接觸媒介，而是置身於、生活於媒介文化中。

五、閱聽人的身分認同／主體性—行動主體

Hall 曾提出三種隨時代變遷的身分認同觀點：（一）啓蒙主體（enlightenment subject），認為人是有中心、統一的個體；（二）社會學主體（sociological subject），自我是在與社會「互動」中形成，因而主體是由社會建構而來；（三）後現代主體（post-modern subject），認為人並無固定、根本或永恆的身分，身分是由我們在文化系統中被再現或對待的方式不斷地形塑與再形塑而來（Hall, 1992, pp. 275-277）。剛好這三種主體與學術典範的遞嬗相吻合，行為典範認為人是有中心、統一的啓蒙主體、批判典範視人是由社會建構而來的社會學主體、觀／展典範則視人為後現代主體。其中，觀／展典範視閱聽人的主動性即彰顯於閱聽人能透過觀／展循環，反覆形塑自己的身分認同，因而閱聽人不單是被結構建構而已，還能透過主體的能動性再形塑其身分認同。

Giddens 在《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一書中以「自我的軌跡」（self

trajectory) 來解釋高度現代性時代中的身分認同，他認為所謂的身分認同是一種敘事，而且為了連貫，行動者會將自我敘事改變成鮮明的記述。他特別提出「生活風格」概念，認為行動者在日常生活中建立的生活風格即是為自我認同的特定敘事賦予物質形式，而且生活風格隱含在多種可能的選擇中，由行動者所採用。生活風格還是例行化的實踐，這類的慣例會融入到衣食習慣、行動方式以及為與他人會面而設計的舒適環境中，但接下來的慣例就會依據自我認同的變動性而反思性地接納改變 (Giddens, 1991/趙旭東、方文譯, 2002, 頁 77-78)。Giddens 闡釋了晚期現代生活的身分認同是如何透過行動者的生活風格抉擇建構而來，如韓劇迷會下載劇中明星使用的手機鈴聲或把劇照用在電腦桌面、林書豪的球迷以穿「Lin7」球衣來建構自己的身分認同，這些都是透過生活風格的建立來形塑自己身為迷的身分。

此外，Giddens 也強調策略性的生活規劃是反思性組織自我軌道的實質內容，所謂生活規劃是「依據自我的個人經歷而動員起來的，是準備未來行動進程的手段」(Giddens, 1991/趙旭東、方文譯, 2002, 頁 81)，Giddens 並強調生活規劃會依據行動者的情境或心智框架的改變而修正和重構。例如亞裔小孩把林書豪當角色模範，發憤兼顧讀書與打籃球，計劃有一天也要循著林書豪的發跡模式，打破亞裔人士難登 NBA 球星之列的玻璃天花板，這已不是生活風格的身分認同，而是攸關策略性的生活規劃。

Giddens 的生活風格選擇和生活規劃都是一種「自我反思性計畫」，是藉由行動者的反思性組織自我身分認同腳本的過程。

實踐轉向的閱聽人身分認同/主體性具「結構化」特色，行動者的主體性既是受制於結構，但結構也是由其社會實踐再生產出來，甚至行動者會以不同的行動協商、調整或翻轉結構。因而實踐轉向的閱聽人是

「行動主體」，不同於行爲典範的個體、批判典範侷限於解讀文本的「詮釋主體」、也非觀／展典範雖是一再建構身分認同的後現代主體但是奇觀式的「表演主體」，實踐典範的主體是表現在社會實踐上，不管是生活風格的慣例性實踐或生活規劃實踐，其主體性是由各種社會實踐彰顯出來，是不折不扣的「行動主體」。

而且此行動主體是因應情境而生，這樣的主體受生活形式影響，是受制於某些常規，但爲因應多變的環境，此主體又常需因時因地制宜，因而其主體性是「既受制又創新」。

六、實踐轉向的研究方法—俗民方法論

不同閱聽人研究典範因立基於不同的本體論與認識論，因此其方法論也大異其趣，如 Abercrombie 與 Longhurst 歸納行爲典範使用的研究方法多爲自我報告、實驗法，批判典範爲文本分析與深度訪談，觀展典範則使用質化研究方法 (Abercrombie & Longhurst, 1998, p. 37)。

在行爲典範盛行時，因其視主體和客體是兩個截然分開的實體，主體可以使用一套既定的工具和方法獲得對客體的認識，主體與客體是二元分離的，不能相互滲透 (陳向明，2002，頁 17-18)，因而其研究方法比照自然科學，強調嚴謹的操作設計、著重信度、效度考驗等，以確保研究結果具有推論的普遍性，並做爲預測與控制的基礎。這時期大多數的「效果研究」就是以量化的調查法或實驗法爲主，對閱聽人的認知、態度、行爲是否發生改變進行科學性的客觀研究，並據以推論與預測。

及至批判典範，如 Hall 指出是從行爲觀點轉變成意識形態觀點，認爲社會真實的背後存在真實的權力結構，「現實」是歷史的產物，研

究者的價值觀不可避免會影響到被研究者，研究的目的是通過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對話和互動來超越被研究者對「現實」的無知與誤解，以喚醒他們在歷史過程中被壓抑的真實意識（陳向明，2002，頁20）。因此，批判典範下的閱聽人研究如第一代接收分析的製碼／解碼模式，研究者一方面以文本分析研究製碼端，另一方面以訪談方式研究閱聽人如何解碼，再來比對閱聽人是採優勢解讀或是對立性解讀，關注的是閱聽人的詮釋能力能否抵抗意識型態的收編；這時期的文本分析多採羅蘭巴特的符號學分析或傅柯的論述分析；在訪談方面則以伽達默的詮釋學為基礎，強調理解是主客體共同參與建構，著重在主客體「視域融合」，以使真理開顯（Gadamer, 1960／洪漢鼎譯，2004，頁8）。

到了第二代接收分析興起閱聽人研究民族誌轉向，這時研究方法擷取人類學的民族誌，且以 Geertz 的「厚描」（thick description）理論為主，強調民族誌不是在做客觀描述，而是在進行詮釋活動，且是對詮釋的再詮釋：「文化分析是意義的推測，對這個推測進行評估，而且從較好的猜測推出解釋性的結論，而不是去發現意義的大陸，畫出其沒有具體景觀的地圖」（Geertz, 1973, p. 20），所以厚描強調的是詮釋的「厚度」，亦即能否深入到現象背後隱藏的意涵，而非去掌握井然有序的意義秩序，是「靠科學的想像力帶我們去接觸陌生人的生活」（Geertz, 1973, p. 16）。

而近來新興的觀／展典範預設閱聽人在媒介浸泡→日常生活→展演→奇觀／自戀的四個環環相扣的過程中形成觀／展循環，因而研究方法多採深度訪談、民族誌、網路文本分析等對閱聽人在大量接收媒介內容後，其在日常生活中與人互動及情緒投入、以及各種標誌身分認同式的展演，進行深度觀察。

至於實踐典範其本體論是主客體合一的「在世存有」，視行動者在

生活中是以自然態度與情境合而為一。然而一般研究者對其日常實踐多以「分析的態度」建立概念、規則、理論，是一種主客體二元對立的視角，與行動者在日常生活中主客合一的自然態度大相逕庭。因此，實踐典範的方法論植基於俗民方法論，對研究者採用的研究方法進行反思，認為研究者多以學術為本位，而非以人為本位，俗民方法論即提供不同的觀點，目的在呈現俗民在建構其理所當然的世界自有其技能／實踐，如 Watson 指出的：「俗民方法論是社會學的、描述的、非嘲諷的，與學者出於知識論、分析的、嘲諷的計畫不同」（Watson, 1993, p. 407）。

實踐典範常採用的研究方法如俗民方法論的會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即著重訪談過程中受訪者說什麼或不說什麼，以了解閱聽人表達背後隱藏的深層意義；或是採用打破行動者自然態度的破壞經驗法（breaching experiments），由研究者參與角色扮演，破壞既存的規範，藉以觀察被研究者如何因應，由此看出行動者如何建構社會事實；另外也可以質性研究方法如深度訪談、民族誌進行結構化分析，一則觀察行動者的話語意識與行動意識等日常生活實踐如何再生產出制度、結構面向，或是如何以結構中蘊含的資源翻轉結構；又可以在受訪者的日常生活中觀察其如何應用 Bourdieu 所謂的「謀略」、de Certeau 的「戰術」等即興創意因時因地制宜的一面。

茲以下表總結以上有關以實踐轉向研究閱聽人的六項綱要之重點所在，並與不同典範對閱聽人預設之差異性做一比較，從中可一窺不同研究典範對閱聽人之研究焦點、閱聽人型態、媒介觀、脈絡觀、閱聽人主體性及研究方法均有不同的預設，而以實踐轉向進行閱聽人研究，是一種主客體合一的整體觀，閱聽人與日常生活世界是合而為一，這樣的整體觀賦予閱聽人研究對閱聽人置身的脈絡、媒介觀、主體性有不同的視

角；此外，對網路崛起帶來的閱聽人景觀變遷，實踐典範也提供不同的研究焦點、閱聽人型態與研究方法，使時下閱聽人研究能在閱聽人多元異質發展中，能有效的聚焦並以自成一格的研究取徑修補理論與經驗的差距。

表一：不同典範對閱聽人預設之相異性比較

	行為典範	批判典範	觀／展典範	實踐轉向
研究焦點	閱聽人有什麼樣的需求與滿足	閱聽人如何解讀文本	閱聽人出於自戀的需求而做哪些奇觀式的展演	閱聽人有什麼樣的社會實踐
閱聽人型態	大眾閱聽人	詮釋社群	擴散的閱聽人	閱聽人社群
媒介觀	刺激	文本	媒介景觀	媒介文化
脈絡觀	去脈絡化	文脈、日常生活	全球化脈絡	生活形式
閱聽人主體性	啓蒙主體	詮釋主體	表演主體	行動主體
研究方法	調查法、實驗法	文本分析、民族誌	深度訪談、民族誌、網路文本分析	俗民方法論、質性研究方法

參考書目

- 宋偉航譯（2004）。《實作理論大綱》，台北：麥田。（原書 Bourdieu, P. [1972]. *Esquisse d'une théorie de la pratique: Précédé de trois études d'ethnologie kabyle*. Paris, Fr: Droz.）
- 李康、李猛譯（2002）。《社會的構成》，台北：左岸文化。（原書 Giddens, A.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洪漢鼎譯（2004）。《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上海：上海譯文。
（原書 Gadamer, H. G. [1960]. *Wahrheit und methode. Grundzüge einer philosophischen hermeneutik*. Tübingen, DE: J. C. B. Mohr.）
- 張君玖譯（1995）。《社會科學的理念》，台北：巨流。（原書 Winch, P. [1958]. *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London, UK: Routledge.）
- 陳巨擘（1995）。〈導讀〉，《社會科學的理念》，頁 1-22。台北：巨流。
- 陳向明（2002）。《社會科學質的研究》。台北：五南。
- 陳雪雲（2004）。〈媒介與我：閱聽人研究回顧與展望〉，翁秀琪（編），《台灣傳播學的想像（上）》，頁 305-345。台北：巨流。
- 陳嘉映、王慶節譯（1989）。《存在與時間》，台北：唐山。（原書 Heidegger, M. [1962]. *Sein und Zeit*. Tübingen: M. Niemeyer.）
- 程樹德、傅大為、王道還、錢永祥譯（1994）。《科學革命的結構》，台北：遠流。（原書 Kuhn, T. [1972].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鄒理民譯（1991）。《知識社會學：社會實體的建構》，台北：巨流。（原書 Berger, P. L., & Luckmann, T.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 趙旭東、方文譯（2002）。《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台北：左岸文化。（原書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盧嵐蘭（2007）。《閱聽人與日常生活》。台北：五南。
- 楊正敏（2004 年 6 月 10 日）。〈90 小時 呈現魔戒畢業典禮 附中生搞酷炫 拿手電筒入會場 「甘道夫」頒畢業證書 朱學恆也欣賞〉，《聯合報》，B2 版。
- 羅世宏等譯（2004）。《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台北：五南。（原書 Barker, C. [2000].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UK: Sage.）
- Abercrombie, N., & Longhurst, B. (1998). *Audiences: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performance and imagination*. Thousand Oaks, CA: Sage.
- Alasuutari, P. (Ed.). (1999). *Rethinking the media audience*. London, UK: Sage.
- Appadurai, A.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Barnes, B. (2001). Practice as collective action. In T. R. Schatzki et al. (Eds.),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 London, UK: Routledge.
- Bird, S. E. (2003). *The audience in everyday life*. London, UK: Routledge.
-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R. Nice, Tra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2)

- Bourdieu, P., & Wacquant, L. J. D. (1998).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ollins, H. M. (2001). What is tacit knowledge? In K. K. Cetina, T. R. Schatzki & E. Savigny (Eds.),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 London, UK: Routledge.
- Couldry, N. (2004). Theorising media as practice. *Social Semiotics*, 14(2), 115-132.
- de Certeau, M.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Felski, R. (2002). The invention of everyday life. In T. Bennett & D. Watson (Eds.), *Understanding everyday life* (pp. 46-50). Oxford,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 Geertz, C. (1973).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Goffman, E. (196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 Hall, S. (1992).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S. Hall, D. Held & T. McGrew (Eds.),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 (pp. 273-316).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Hall, S. (1995). The rediscovery of ideology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in media studies. In O. Boyd-Barrett & C. Newbold (Eds.), *Approaches to media: A reader* (pp. 354-364). London, UK: Arnold.
- Hay, J. (1996). Afterword: The place of the audience: Beyond audience studies. In J. Hay, L. Grossberg & E. Wartella (Eds.), *The audience and its landscape* (pp. 359-377). Boulder, CO: Westview.
- Kishik, D. (2008). *Wittgenstein's form of life: To imagine a form of life*. London, UK: Continuum.
- Lindlof, T. R., & Shatzer, J. (1998). Media ethnography in virtual space: Strategies, limits and possibilities.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and Electronic Media*, 42(2), 170-189.
- McLuhan, M.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London, U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Neuman, W. R. (1991). *The future of the mass audien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 Stern, D. (2003). The practical turn. In S. P. Turner & P. A. Roth (Eds.), *The blackwell guide to th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pp. 185-206). Malden, MA: Blackwell.
- Swidler, A. (1986).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273-286.
- Swidler, A. (2001). What anchors cultural practices. In T. R. Schatzki et al. (Eds.), *The practice turn in contemporary theory*. London, UK: Routledge.
- Wang, G., Servaes, J., & Goonasekera, A. (Eds.). (2000). *The new communications landscape: Demystifying media globalization*. London, UK: Routledge.
- Watson, G. (1993). A comparison of social constructionist and ethnomethodological descriptions of how a judge distinguished between the erotic and the obscen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24(4), 405-425.

A Practice Turn Theoretical Investigation of Audience Research

I-yen Wang*

ABSTRACT

This study determines an alternative audience paradigm to resolve the gaps between audience theory and practical situations. After reviewing new developments in recent audience research, the author found that the practice paradigm has the potential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Thereafter, the author reviewed the central audience-related concepts of practice theory and established six “practice turn” outlines for audience research that reorient research focus, audience presumptions, media conceptions, receiving contexts, subjectivity, and research methods regarding audiences. The author hopes that these six research outlines can be used as a theoretical basis to perform audience “practice turn” experiential research in the future.

Keywords: Audience, form of life, media culture, practice turn, shared practice

* I-yen Wang is working in the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Tourism, Taipei City Government.

